

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相关性 研究综述:经济互补与统计互补的视角^{*}

高 越 李荣林

摘要: 在不同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既可以是替代关系也可以是互补关系。现实中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之间的相关关系一方面反映了二者之间真实的经济互补关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虚假的统计互补关系。垂直联系机制和水平联系机制构成经济互补关系的传递渠道,出口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共存成为统计互补关系的基础。在经验分析中,只有控制同时影响二者的外生因素,才能剔除统计互补的影响,得出二者之间的真实关系。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国际贸易 互补与替代

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国际贸易的相互影响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准确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从Mundell(1957)提出贸易和要素流动的替代性关系以来,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很大进展。^①从Markusen(1984)和Helpman(1984)开始,学者们开始把FDI融入到一般均衡贸易理论中来。这些理论认为依据FDI类型的不同,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既可以是替代也可以是互补关系,但大多数经验研究表明二者是互补关系。Head和Ries(2004)认为,经验研究中普遍发现的FDI与国际贸易的互补关系是由两个原因导致的,一个是“统计互补(statistical complementarity)”,另一个是“经济互补(economic complementarity)”,二者分别表明FDI和国际贸易之间的虚假互补性和真实互补性。统计互补是由同时影响FDI与国际贸易的外生变量导致的,并不反映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而经济互补反映了二者之间真正的因果关系。本文借用这一概念,对相关的研究进行总结,以期梳理出导致经济互补和统计互补的传递渠道,为经验研究克服统计互补的虚假影响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跨国公司理论的观点

FDI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把跨国公司融入到一般均衡贸易理论中,考察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在这类模型中,公司的活动分为两种,一种是公司水平的特定活动,包括研发、销售、管理服务等,另一种是工厂水平的特定活动,这两种活动分别导致公司固定成本和工厂固定成本。公司水平的特定活动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能同时被多个工厂使用。跨国公司在做出决策时,需要权衡公司固定成本、工厂固定成本以及贸易成本等对经营利润或成本的影响,从而选择是否投资、选择水平投资还是垂直投资或者出口平台型投资。

Brainard(1993)提出了“临近-集中”假设,她认为,相对于出口来说,水平FDI面临着在东道国投资建厂的工厂固定成本,但不需要支付产品从母国到东道国的运输成本。因此,当固定成本越低,运输成本越高时,水平FDI越容易产生。另外,当公司固定成本越高时,建立越多的工厂就越有利;当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时,较多的产量能够分担工厂固定成本,因此,当公司固定成本越高和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时,水平FDI也越容易产生。Markusen和Venables(1998,2000)分别应用同质产品的古诺寡占模型和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分析了在母国和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要素禀赋不对称时跨国公司的投资与出口决策问题,认为当国家规模和

^{*} 高越、李荣林,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300071,电子信箱:gaoyue@mail.nankai.edu.cn,lronglin@mail.zlnet.com.cn

^① 李荣林(2002)对早期的文献做了回顾和评述。

要素禀赋较为相似时,水平 FDI 越容易产生。在水平投资情况下,跨国公司通过在东道国复制母国的生产活动,并供应东道国市场,所以投资之后东道国当地的生产取代了母国的出口,在这种情况下,FDI 与出口是替代关系。

Helpman(1984)、Helpman 和 Krugmar(1985)把跨国公司融入到要素禀赋模型中,开创了垂直 FDI 的研究,这种理论强调要素禀赋差异对跨国公司选择的影响。在没有运输成本和其他贸易障碍的情况下,假设存在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一种同质产品和一种差异化产品)和两种要素,差异化产品的生产包括两个阶段——中间产品生产和组装,其中中间产品的生产比组装更加资本密集。当两国要素禀赋差异较小时,仅通过贸易就能导致要素价格均等化,因此跨国公司没有必要产生。当两国要素禀赋差异较大时,仅仅通过贸易不能导致要素价格均等化,这时跨国公司就会产生。跨国公司会把中间产品生产放在资本相对充裕的国家,而把组装放在劳动相对充裕的国家。垂直投资发生后,母国向东道国出口中间产品,而东道国组装成最终产品后同时供应母国和东道国。因此,在中间产品层面上,垂直 FDI 与母国的出口是互补的,但在最终产品层面上,二者具有替代关系。

水平投资理论和垂直投资理论都只考虑一种类型的跨国投资,或者是垂直型投资或者是水平型投资。Markusen(1997)提出的知识资本模型允许这两种投资活动的同时存在。知识资本模型假定跨国公司具有创造出公司规模经济的知识性资产,跨国公司的固定成本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从地理上将总部和单一工厂分割开来的成本相对较低;相对于生产来说,知识性资产属于熟练劳动密集型;多工厂跨国公司的固定成本具有联合性,即知识性资产的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与建立一家带有当地工厂之公司相比,建立第二家工厂所增加成本要小。前两个特点促使跨国公司产生垂直投资的动机,而第三个特点促使跨国公司产生水平投资的动机。当国家之间的要素禀赋和市场规模越接近,并且贸易成本越高时,水平型跨国公司越活跃;当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越大,并且贸易和投资成本越低时,垂直型跨国公司越占优势。^① 所以,在知识资本模型中,贸易和投资的关系依赖于哪一类公司占据主导地位。

除了水平型投资和垂直型投资以外,出口平台型 FDI(Export-Platform FDI)成为近期研究的热点。出口平台型外商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生产的目的是向母国和东道国以外的第三国销售。Ekholm 等(2004)将出口平台型外商直接投资分成三种类型:产品返销母国的母国出口平台,产品出口到第三国的第三国出口平台,产品既出口母国又出口到第三国的全球出口平台。跨国公司选择哪一种类型依赖于各国的边际生产率、各国之间的贸易成本以及各种固定成本。在出口平台型 FDI,第三国的引入对母国和东道国的贸易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类投资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利用国家之间的生产成本优势,所以具有垂直型投资的特点,因此促进了母国中间产品的出口;母国利用东道国作为出口平台向第三国出口,所以促进了东道国的出口,但由于替代了母国向第三国的出口,因此又具有水平投资的特点。与垂直型投资一样,出口平台型 FDI 和复合型 FDI 虽然促进了母国中间产品的出口,但替代了最终产品的出口。

就以上理论的研究思路而言,都承接了邓宁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的特点,即把出口与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生产以供应当地市场看成是跨国公司的替代选择。因此,FDI 与母国最终产品出口必然是替代关系。但在垂直型投资、出口平台型投资情况下,投资会引致母国中间产品出口的增加,这成为这些理论中 FDI 与母国出口互补关系的惟一传递途径。FDI 是否带动母国净出口的增加取决于中间产品在最终产品中占的比重和东道国的需求弹性,若中间产品占的比重较大和东道国的需求弹性较大,那么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带来成本下降,而导致东道国对母国中间产品需求的增加就越大,这时 FDI 倾向于带动净出口的增加。反之,则倾向于带来净出口的减少。

二、经济互补的传递渠道

跨国公司理论揭示了水平型投资是替代贸易的,而垂直型投资和出口平台投资虽然促进了中间产品的出口,但替代了最终产品的出口。因此,投资带动中间产品出口成为引起经济互补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经济互补产生的原因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分别是单一产品的直接投资、资源寻求型直接投资和水平联系产品的直接投资。

当一个公司只生产一种产品时,如果跨国公司通过对外投资在东道国设立销售机构或售后服务机构,那

^① Markusen 和 Venables(2007)考察了当存在多个国家、多种产品和多个生产环节时,水平型投资、垂直型投资和出口平台投资的内生决定问题。

么就能够扩大东道国的消费者需求,从而带动出口的扩大。Lipsey 和 Weiss(1984)认为,通过 FDI 方式提供售后服务,能使需求曲线向右移动。Head 和 Ries(2001)认为,销售机构或售后服务机构能向国外消费者提供有价值的服务,这种服务是东道国当地的销售代理不能完全提供的。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商业存在,意味着对东道国市场提供长期优质服务的一种承诺,这对于某些行业,例如机器设备行业,是很重要的。因此,当考察单一产品时,跨国公司在销售和售后服务环节的对外投资可以促进出口。

当一种产品的生产可拆分为多个生产环节时,在一定的条件下,跨国公司会把一部分生产环节安排在国外生产,从而形成了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一体化生产。^①如果上游属资源密集型生产(例如采矿),而下游属资本或劳动密集型生产,当上游阶段安排在国外生产,而下游阶段安排在母国时,会促进母国资源产品的进口和最终产品的出口,这种投资即为资源寻求型 FDI。在这种投资形式下,FDI 是否带动净出口的增加取决于中间产品在最终产品中所占比重和东道国的需求弹性,若中间产品所占比重小和东道国的需求弹性大,则 FDI 倾向于带动净出口的增加。Aizenman 和 Noy(2006)考察了 FDI 和国际贸易的跨期相互联系,为二者在跨期内的互补关系提出了解释。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时,会选择生产率与工资之比最高的国家。由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生产增加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会提高东道国人力资本的报酬,导致东道国熟练劳动力供给的增加。这会进一步增加东道国对 FDI 的吸引力,并且进一步扩大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贸易。与以往学者不同,Aizenman 和 Noy(2006)揭示了 FDI 和贸易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而不是由 FDI 影响贸易的单向关系。^②

在水平联系产品方面,外部性的存在使 FDI 促进贸易成为可能。Swenson(2004)认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存在会刺激东道国对跨国公司其他产品甚至是母国产品的需求。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生产后,通过良好声誉和品牌的创造、信息的共享和正的需求外部性,扩大东道国对母公司该种产品、母公司其他产品,甚至母国所有产品的需求。Carpenter(2005)认为,通过在东道国当地生产某种产品,通过邻近优势不仅节省了该产品的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而且通过溢出效应促进本公司其他产品的销售。这种溢出效应包括公司良好形象的树立,使产品更容易满足东道国的消费偏好以及充分利用分支机构的人员和设施来降低成本。这样,这种投资提高了母国的总需求,导致了贸易和投资的互补关系。

以上研究揭示了三种经济互补的传递渠道,扩展了跨国公司理论的结论。单一产品的直接投资实际上属于服务业对外投资,当把售后服务看做产品价值链的一部分时,这种投资就类似于垂直型投资。资源寻求型直接投资与垂直型投资既有共同点也有区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 FDI 对于母国净出口的促进作用依赖于东道国的需求弹性,当东道国的需求弹性越大时,二者都倾向于带动母国净出口的增加;不同点在于二者带来中间产品的流向是不一样的,垂直型投资促进母国出口中间产品,而资源寻求型直接投资带动母国进口中间产品,因此,二者产生的经济互补机制是不一样的,前者依赖于中间产品出口的增加,而后者依赖于最终产品出口的增加。水平联系产品的直接投资导致的经济互补机制依赖于 FDI 的正的溢出效应。因此,经济互补的传递渠道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是垂直联系机制,包括垂直型投资、单一产品的直接投资和资源寻求型直接投资;另一类是水平联系机制,即水平联系产品的直接投资。

三、统计互补的传递渠道

FDI 与国际贸易具有统计互补关系的前提是必须能够共存,只有在二者共存的条件下,由于共同受到外生变量的影响,才能导致二者呈现统计互补关系。学者们主要从同质性公司、异质性公司和单一公司的角度解释出口与 FDI 的共存现象。

当考察同质性公司时,Head 和 Ries(2004)认为“挤出效应”使得同行业选择出口的企业与选择 FDI 的企业并存。设想这样一种情况,在初始状态下,所有公司都选择出口方式,当由于某种原因(例如由于工厂固定

① 一体化生产是分割生产的一个子集。分割生产可以通过一体化生产的形式,把部分生产环节安排在东道国的子公司生产,也可以通过外包(outsourcing)的形式,由东道国的企业进行生产。两者都会导致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中间产品贸易,但前者属于公司内贸易,后者属于公司间贸易。Antras 和 Helpman(2004)认为,在过去几年中,美国企业外包生产的增长已经超过了一体化生产的增长。

② Kiyota 和 Urata(2005)揭示了国际贸易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另一种关系。他们认为,大多数跨国公司是通过出口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再对外投资,因此他们认为跨国公司不是在“出口”和“对外投资”之间选择其一,而是在“出口”中选择是否“对外投资”。基于此,他们验证了 1994-2000 年日本公司的数据,结论是二者为互补关系。

投资水平的下降)使得至少有一个公司转变为 FDI 方式更有利可图时,一部分公司会通过 FDI 方式供应国外市场。但由于整个行业面临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最终会由于最后一个公司的转变而导致企业选择出口与选择 FDI 获得相同的利润,因此转变为 FDI 方式的公司数量会受到限制,从而选择出口与选择 FDI 的企业并存。Brainard(1997)认为,同质性公司的自我选择会使它们区分为出口企业和 FDI 企业,但我们不能确定哪些企业是出口企业,哪些企业是 FDI 企业。

考虑公司异质性的理论假定公司具有不同的出口或 FDI 固定成本,或不同生产率,从而不同的公司在面临相同的外部环境下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所以就能够确定哪些公司选择出口方式、哪些选择 FDI 方式。Helpman 等(2004)通过引入不同公司具有不同生产率的假设扩展了“临近-集中”模型,认为生产率最高的公司选择 FDI 方式,具有中等生产率的公司选择出口方式,而具有最低生产率的公司或者只在国内销售或者离开这个行业。由于 Helpman 等(2004)假定母国和东道国要素价格相同,因此他们的模型中只考虑水平型 FDI。Head 和 Ries(2003)考察了母国与东道国要素价格和市场规模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异质性公司的垂直投资选择问题。他们得出的结论与 Helpman 等(2004)的结论不尽一致,甚至在模型参数的某些范围内得出相反的结论。例如,如果东道国要素价格较低并且市场规模较小,那么母国生产率最低的公司有可能采取垂直 FDI 方式,而生产率较高的公司只在国内生产。这是因为低生产率公司更加密集地使用东道国的廉价要素,所以更愿意支付在东道国投资的固定成本。

对于向同一个目标市场供应单一产品,一个公司也可能会同时选择出口和 FDI 方式。Kogut 和 Kulatilaka(1994)认为,当跨国公司在国内生产面临生产成本的不确定性时,会倾向于在东道国建立分支机构,同时保留在国内的生产。Choi 和 Davidson(2004)把 Kogut 和 Kulatilaka(1994)的研究扩展到寡占市场(oligoplistic),认为当公司之间采取价格竞争时,会倾向于同时选择出口和 FDI 形式。Rob 和 Vettas(2003)考虑当东道国的需求增长存在不确定性并且 FDI 是沉没成本时,如果东道国的需求变小,在东道国的生产能力就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因此,在一定条件下,跨国公司会选择 FDI 以满足意料中的需求增长,同时选择出口以供应未意料到的需求增长。Mukherjee(2004)考虑了垂直生产关系,他认为,当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生产需要使用东道国的中间投入品时,跨国公司的生产会提高中间投入品的价格。如果同时采取出口的形式,会对东道国中间投入品价格的上涨起抑制作用。因此,从中间产品的低价格获得的收益有可能抵消选择出口产生的额外成本。

以上学者的研究考察了不同情况下出口与 FDI 的共存现象,这种共存现象成为二者具有统计互补关系的基础。一个行业中不同的公司对于同一目标市场和一个公司对于不同的目标市场都可能会选择不同的进入方式,因此导致了在加总的国家和行业层面 FDI 和出口显示出共存现象;一个公司的不同产品对同一个目标市场可能会采取不同的进入方式,一个公司的同一产品对同一个目标市场也可能会同时采用出口和 FDI 方式,因此导致了在公司和产品层面 FDI 和出口的共存现象。总之,在加总程度越高的层面,例如国家层面,越容易产生 FDI 和出口的共存现象。在二者共存时,由于共同受到外生变量(例如东道国需求水平的外生性增加)的影响,所以会出现一致的上升趋势,从而呈现出统计互补关系。

四、结束语

跨国公司理论揭示的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替代关系仅适用于单一公司的单一产品,只有使用微观层面数据才容易得出二者之间的替代关系。在宏观层面经验分析中,必须控制同时影响二者的外生因素,才能够剔除统计互补的影响,从而得出二者之间的真实关系。现实中影响 FDI 与国际贸易之间关系的因素很多,除了本文提到的各种直接的效应外,还存在许多不易度量的效应,例如,如果 FDI 通过外部性影响了东道国的生产率、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而不是外生变量引起的),从而进一步影响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但这些影响是经过较长时间才发挥作用的,也是经验研究不容易把握的。

大多数已有研究在考察 FDI 和国际贸易的关系时,只考察 FDI 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国际贸易对 FDI 的影响,这种反作用必然也会影响二者关系。如同 FDI 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一样,国际贸易对 FDI 的影响也可以分为经济互补和统计互补两个方面。因此,FDI 和国际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FDI 对国际贸易的经济互补关系,国际贸易对 FDI 的经济互补关系和两者之间的统计互补关系。所以,在经验研究中,需要对 FDI 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加以分解,即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中有多少是由 FDI 引起国际贸易导致的,有多少是由国际贸易引起 FDI 导致的,还有多少是由同时影响二者的因素决定的。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较为欠缺。

(下转第 135 页)

pp.275-291 .

17. Hubbard,J. andMichaely,R . ,1997.“ DoInvestorsIgnoreDividendTaxation?Areexami-nationoftheCitizen ’sUtilitiesCase . ” JournaloffinancialandQuantitativeAnalysis,Vol.32,pp.117-135 .
18. Kraus,A. andLitzenberger,R . H . ,1973. “ AState-preferenceModelofOptimalFinancialLeverage . ” JournalofFinance,Vol.28, pp.911- 922.
19. Lemmon,M ;RobertsM . andZender,J . ,2006. “ BacktotheBeginning:PersistenceandtheCross-sectionofCorporateCapital Structure ”WorkingPaper,Wharton.
20. MacKie-Mason,J . K . ,1990.“ DoTaxesAffectCorporateFinancingDecisions? ” JournalofFinance,Vol.45 (5) ,pp.1471-1493 .
21. Matheson,T . ,2006.“ TheEffectoftheCorporateIncomeTaxonLeverageinPublicCorporations . ” U.S.DepartmentofTreasury WorkingPaper.
22. Miller,M. H . ,1977.“ DebtandTaxes . ” JournalofFinance,Vol.32,pp.261-275 .
23. Miller,M. H. andScholes,M . ,1982. “ DividendsandTaxes:SomeEmpiricalEvidence . ” 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90, pp.1118-1141 .
24. Modigliani,F. andMiller,M . H . ,1958. “ TheCostofCapital,CorporationFinanceandtheTheoryofInvestment . ” TheAmerican EconomicReview,Vol.48,pp.261-297 .
25. Modigliani,F. andMiller,M . H . ,1963. “ CorporateIncomeTaxesandtheCostofCapital:ACorrection . ” TheAmericanEconomic Review,Vol.53 (3) ,pp.433-443 .
26. Myers,S. C . ,1984 “ TheCapitalStructurePuzzle . ” JournalofFinance,Vol.39,pp.575-592 .
27. Naranjo,A. ;Nimalendran,M. andRyngaert,M . ,1998. “ StockReturns,DividendYields,andTaxes . ” JournalofFinance,Vol.53, pp.2029-2057 .
28. Pittman,J. andKlassen,K . ,2001. “ TheInfluenceofFirmMaturationonFirms ’ RateofAdjustmenttoTheirOptimalCapital Structures ” JournaloftheAmericanTaxationAssociation,Vol.23,pp.70-94 .
29. Shevlin,T . ,1990.“ EstimatingCorporateMarginalTaxRateswithAsymmetricTaxTreatmentofGainsandLosses . ” TheJournalofthe AmericanTaxationAssociation,Vol.12,pp.51-67 .

(责任编辑:王红霞、杨丽艳)

(上接第 128 页)

参考文献:

1. 李荣林:《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关系:文献综述》,载《世界经济》,2002(4)。
2. Aizenman,JoshuaandNoy,Ilan,2006. “ FDIandTrade —Two-wayLinkages? ” TheQuarterlyReviewofEconomicsandFinance,Vol. 46 (4) ,pp.317-337.
3. Antr ̃a,PolandHelpman,Elhanan,2004. “ GlobalSourcing. ” 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112 (3) ,pp.552- 580.
4. Brainard,S.Lael,1993. “ ASimpleTheoryofMultinationalCorporationsandTradewithaTrade-offbetweenProximityand Concentration. ” NBERWorkingPaper,No.4269.
5. Carpenter,Theresa,2005. “ Multinational,Intra-firmTradeandFDI:aSimpleModel. ” HEIWorkingPaper,No . 1,GraduateInstitute ofInternationalStudiesGeneva .
6. Choi,J.P.andDavidson,C . ,2004.“ StrategicSecondSourcingbyMultinationals. ” InternationalEconomicReview,Vol.45 (2) ,pp.579 -600.
7. Ekholm,K.;Forslid,R.andMarkusen,J.R.,2004. “ Export-PlatformForeignDirectInvestment. ” IISDiscussionPaper,No.50.
8. Head,KeithandRies,John,2003. “ HeterogeneityandtheFDIversusExportDecisionofJapaneseManufactures. ” Journalofthe JapaneseandInternationalEconomics,Vol.17 (4) ,pp.448- 467.
9. Head,KeithandRies,John,2004. “ ExportingandFDIasAlternativeStrategies. ” OxfordReviewofEconomicPolicy,Vol.20 (3) ,pp. 409-423.
10. Helpman,E.andKrugman,P.R.,1985. MarketStructureandForeignTrade. Cambridge,MA:MITPress.
11. Helpman,E.;Melitz,M.andYeaple,S.,2004. “ ExportversusFDI. ” 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94,pp.300-316.
12. Helpman,E.,1984. “ ASimpleTheoryofTradewithMultinationalCorporations. ” 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92,pp.451- 471.
13. Markusen,J.R.andVenables,A.J.,2000. “ TheTheoryofEndowment,Intra-industryandMultinationalTrade. ” Journalof InternationalEconomics,Vol.52,pp.209-234.
14. Markusen,J.R.andVenables,A.J.,2007. “ InteractingFactorEndowmentsandTradeCosts:aMulti-country,Multi-good ApproachtoTradeTheory. ” underRevisionforthe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
15. Markusen,J.R.,1997. “ TradeversusInvestmentLiberalization. ” NBERWorkingPaper,No.6231,October.
16. Arijit,Mukherjee,2004. “ 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ExportunderImperfectlyCompetitiveHost-countryInputMarket. ” No.65, RoyalEconomicSocietyAnnualConference2004fromRoyalEconomicSociety.
17. Rob,R.andVettas,N.,2003. “ 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ExportswithGrowingDemand. ” ReviewofEconomicStudies,Vol.69, pp.1-20.
18. Swenson,DeborahL.,2004. “ ForeignInvestmentandtheMediationofTradeFlows. ” 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 Vol.12 (4) , pp.609- 629.

(责任编辑:陈永清)